

从文华图专到武汉大学图书情报 学院的档案教育

查启森

今年，是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以下简称武大图院）院庆70周年，同时，又是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以下简称文华图专）档案管理学科成立50周年。文华图专不仅是我国第一所培养图书馆专门人才的学校，而且是我国第一个开办档案教育，培养档案专门人才的学校。她在我国档案事业史，特别是档案教育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

周恩来总理生前说过：“中国的档案历史是世界上最早的，也是最丰富的。”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国的档案教育，开始却是较晚的，比起西方，如法、奥、德诸国，要晚一百多年或几十年。法国的档案学院成立于1821年，是世界近代档案教育产生的标志。我国档案教育则发生在1934年，即在这一年，文华图专才开始设立档案管理特种教席，开设《档案管理法》一课。最初，它只是对图书馆学专业学生作为一门课程讲授，并没有形成一门独立的专业。但受过档案管理教育的学生，毕业后从事档案工作的却不少，且多有建树。如仍健在已逾八十高龄的中山大学图书情报学系教授周连宽先生，曾长时间从事档案工作，著有《县政府档案处理法》（1935年）、《县政府文书处理法》（1935年）、《公文处理法》（1945年6月）、《档案管理法》（1945年11月）等著作；又如程长源先生、傅振伦先生，都是文华图专图书馆学专业出身，也都分别著有《县政府档案管理法》（1936年）和《公文

档案管理法》（1947年）等。这些著作，是我国档案学形成时期的奠基著作，至今仍被视为有影响的档案学著作。这说明，文华图专开设档案管理课程，对我国档案事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抗日战争爆发后，武汉沦陷，文华图专于1938年被迫迁往重庆继续办学。鉴于当时重庆处于抗战的大后方，内地迁往机关甚多，迫切需要档案专门人才，于是在1939年秋，文华图专呈请湖北省教育厅开办讲习班（当时称第五期讲习班，前四期为图书馆讲习班，这一期为专门的档案管理讲习班），招收高中毕业生，进行档案管理的专门训练，学制为一年。随后，在1940年春、秋两季，又先后招收两届学员，并直接命名为档案管理训练班。不久，经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批准，成立档案管理学科，并将这两届学员分别编为档一级和档二级，纳入档案管理学学习，学制始为二年，1947年后改为三年。先后共招收6届，入学人数共83人，毕业人数共51人。

文华图专除正式开办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档案管理学科之外，还陆续开办了各种短期的训练班。1942年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指定其办理档案管理短期职业训练班，“养成管理档案之中级技术人才，以适应各机关增进行政效率之需要”（《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附设教育部指办档案管理短期职业训练班第一期招生简章》）。至1947年7月，共办7期，每期3~4个月不等，共

培训学员近200人。

解放后,经中南军政委员会批准,于1950年9月至1951年1月,又举办了为期4个月的档案资料短期训练班,共招收学员45人,1952年还最后举办了三次档案管理专题讲座。至此,文华图专的全部档案教育结束。

文华图专的档案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档案专业教育体系。其办学层次多样而灵活,适应了当时档案工作的需要。她先后为当时各级各类档案部门输送了三百多名中高级档案专门人才,这些人后来活跃在档案界,形成了文华系统的力量,被称为“文华集团”。他们的档案学思想,在我国档案学史上独树一帜,被称为“文华派”。如代表人物之一的黄彝仲,是档一级的毕业生,他所著作的《档案管理之理论与实际》,当时颇得好评。

文华图专的档案教育,反映了档案学形成时期的许多特点,并对我国档案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华图专的档案教育,可以说是在图书馆学教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最初,档案管理只被看作是图书馆学的一部分,当作是图书馆学教育的“附庸”。后来,经过五、六年“试验之结果”,才认识到:“档案管理之内容并不简单,而许多有关科目,如行政组织、公务管理及文书之制作及处理等,必须循序研究,始能组成一完备知识。故档案管理不能再以图书馆学之附庸视之,而实有独立成科之必要”(文华图专1940年9月26日为拟设立档案管理科呈教育部文)。这样,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档案管理要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当时,由于这一学科尚处于形成时期,无疑会受到图书馆学很深的影响。在档案管理科所开的课程中,图书馆学方面课程所占的比例很重,如图书馆学概论、图书馆行政、图书分类法概论、中国目录学、中文编目法、西文编目法、索引法、检字法等等,都列为其必修或选修的课程。

这样,图书馆学及图书分类学、目录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被运用到了档案学的研究之中,结果是丰富和发展了档案学。因而,有人在论述档案学发展史时,把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档案学发展的图书馆学时代”(寒江:《中国档案学发展史的分期问题》,载《湖南档案》1988年第1期),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文华图专不仅第一次提出档案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且从它所开设的课程中,初步建立了这一学科的体系。如《档案通论》、《档案行政学》、《西洋档案学》、《档案经营法》、《档案编目法》、《档案分类法》、《档案管理》、《公文管理》、《公文研究》等等,就是当时这一学科体系的体现。其中,《档案通论》、《档案经营法》、《档案分类法》和《西洋档案学》等,在学科体系建设中,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档案通论》主要从宏观上讲述档案的意义、范围和功用等,提高学生对档案的认识。

《档案经营法》突破了当时档案学局限于研究现行机关档案的小圈子,从全国着眼,提出了建设国家档案馆网的设想,认为:全国档案机关的组织“可分为独立之档案管理处和附属机关档案管理处两类。独立之档案管理处又可分为全国档案管理处、全省档案管理处、全县档案管理处三级”。此外,还提出了建立国家档案学校的主张。

《档案分类法》比较系统地接受了西方国家档案学理论,明确提出档案分类必须采用法国档案学尊重档案群的原则。所谓档案群,就是“某一完整独立、不受外力支配,而能正式接收处理各方面事务之行政机构,于其政务进行时所产生之一群档案也。”——也就是我们今天所采取的全宗原则。

《西洋档案学》所介绍的是欧美档案工作史和档案学史。这是我国研究外国档案史的开始,既为当时档案学研究填补了一项空白,也为我们今天的研究留下了一定的历史

资料。

正如后来吴宝康教授所总结的：文华图专所开设的这些课程，“集中了当时中外档案学的研究成果，并进一步发展了我国档案学的整个体系”（《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

二

1953年，文华图专并入武汉大学后，保留了图书馆学专业，档案管理科停办。有人指出：“这在我国档案学教育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钱德芳、程晓端：《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开办档案教育始末》，载《图书情报知识》1984年第2期）。所庆幸的是，1982年经原教育部批准，武汉大学恢复档案学专业。由于停办多年，原有师资有的故去，有的调离，名曰恢复，实际上等于重建。几乎经过了两年的筹办，直至1984年秋，才开始正式招收重建后的第一届学生。在此之前，曾与湖北省档案局联合举办过一期档案干部培训班。

在武汉大学档案学专业重建之际，适逢原教育部批准成立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档案专业正式划入学院的图书馆学系。重建后的档案学专业，怎样发展呢？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

我们重建的档案学专业，规模很小，发展较慢。既不能与已经发展为学院规模的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相比，也难以与兄弟院校新建立的这一专业相比。但是，我们也有不少有利条件。其中一条就是，我们专业处在武汉大学这所综合性大学里，这在目前学科处于交叉发展、互相渗透的情况下，是有利于档案学的发展的。特别是我们档案专业处在图书情报学院，这与档案、图书、情报管理一体化发展趋势是相适应的，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如果说，过去文华图专档案教育的发展得力于图书馆学的话；那么，我们今天的档案学专业，也完全可以在新的基础上继承这一传统。目前，在国内我

们还没有发现三个专业如此共存于一体的。因此，从发展档案教育的角度看，实在是很有利的，这是我们档案学专业最大的优势。就我们一个专业的力量来说，是比较小的，但从整个学院来看，力量是不小的。例如，在我们所开设的课程中，哲学、政治、外语、体育等公共课由学校统一安排；相关学科的课程，如图书馆学、目录学、情报学等，则由学院统一安排；本专业所设的档案学教研室，只负责专业基本课程的讲授和全部课程的设置方案。

自1984年档案学专业恢复招生以来，迄今已历4届，毕业生人数达到50人，相当于文华图专档案管理科毕业人数的总和。目前，在校学生也有40人，虽然人数不多，但学生的素质较高，专业思想比较巩固。在师资队伍、教材和课程建设方面，我们也作了不少努力和探索。我们教研室现有专业教师9名，老、中、青各占一定的比例，结构比较合理。我们所使用的教材全部都是自编的，有三种教材还列入了国家教委七·五教材选编计划。从1990~1991学年开始，我们将执行新的教学计划。这个计划，改革了原有一些课程的布局，增设了一些新的课程。如将原《档案管理学》和《科技档案管理学》课程，改为《档案的收集与鉴定》、《档案的著录与标引》、《档案的开发与利用》及《科技档案基础》等课程。新增的课程，主要有《档案法规》、《档案目录学》、《中国文化史》、《欧美档案事业》、《苏联档案事业》、《人事档案管理学》等。

总之，档案学专业重建以来，由于集中了全院乃至全校有关教师的力量，初步形成了档案教育与图书、情报教育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如果说，当年文华图专的档案教育与图书馆学教育的结合，是处在低层次阶段的话；那么，今天的一体化，则是在新的条件下，自觉地向高层次发展。这两种情况，体现了两种社会制度下档案教育的不同水平。